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历史、 现实与未来*

师 博 张冰瑶**

摘 要：本文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遵循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背景之下，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有趋同的收敛态；西部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高，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西部地区不仅面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也面临着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短板约束，必须以新发展理念 and 高质量发展为指导，以创新驱动为发展的基本动力，处理好发展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协同并进。

关键词：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质量 高质量发展

一 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稳健高速增长，中国不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迈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区域经济增长在这一举世瞩目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分权”极大地调动了区域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形成了区域竞争格局。西部地区抓住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机遇迎难而上，逐渐缩小了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然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目标虽然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助长了“掠夺性”开发行为，导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多维互动机制研究”（17XJA790004）阶段性成果。

** 师博，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宏观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张冰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致社会生态问题频现。在越来越多元化的区域竞争面前，西部地区必须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高质量发展方面。“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①，这为西部地区的发展转型指明了方向，即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先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经济表现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特征。在理论研究层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联的增长质量受到了广泛关注^{②③④⑤}。但是增长质量更多地聚焦于宏观经济范畴，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则拓展至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维度。新时代具有新的发展条件，现有文献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是基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因此对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与特征缺乏针对性的研究。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背景下，传统的评价方式难以准确反映新时代的要求和新发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高质量发展的量化评估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质量的研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在新时代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是区域协调发展。鉴于此，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基于五大发展理念，通过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来测算我国省级和地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比较分析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所表现出的经济发展质量的特征，以期能够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二 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在新时代，经济发展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遵循，充分体现和刻画高质

-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21页。
 - ② Thomas, V. etc. *The Quality of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③ Barro, R. 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Central Bank of Chile, 2002, 5 (2): 17-36.
 - ④ 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40页。
 - ⑤ 郝颖、辛清泉、刘星：《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1~114页。

量发展的内涵。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物为本”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性转变。发展质量高低以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准则^①，而美好生活的内涵绝不局限于单纯的以物质需求为代表的经济领域，其核心更拓展至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为西部地区在新时代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②。

一是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从新时代发展的矛盾来看，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应是西部区域的首要任务，然而，尽管西部区域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洼地，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需要遵循复杂系统的经济规律，仍必须把重心放在质量效益上。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一种产品短缺状态，为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实现经济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完成了经济起飞，基本解决了“落后”问题。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质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低收入变为中等收入，从生产力落后的贫穷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以 GDP 论英雄变为实现平衡和充分发展最重要^③。与此同时，我国的主要矛盾业已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暴露出经济发展质量亟须提高。因此，基于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央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二是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对生态脆弱的西部经济又提出了新的约束条件，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来，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共生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虽然物质财富得到了迅速积累，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粗放的增长方式不仅引发了资源约束趋紧，还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受到环境污染的严重侵蚀，人民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与日俱增。生态

①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第5~18页。

② 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第66~746页。

③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第5~18页。

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不良现象能否得到缓解和遏制成为新时代下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判断之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尊重并保护自然，树立和践行新的财富观，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为人民群众打造优质的生态环境。

三是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社会规律。西部区域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民生社会福利发展相对滞后，在高质量的发展中更需要得到关注，打好脱贫攻坚战，补齐民生短板。在低收入阶段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相对匮乏，为了解决贫困问题，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愈发强烈，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令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有可能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羁绊。新时代下和谐的社会发展能够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可能为高质量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的风险隐患。新时代下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增进民生福祉，在高质量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必须充分体现出其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现在，具有增速稳定和结构合理的经济增长基础，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①。基于此，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遵循的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应充分把握如下三个准则。

一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需要用新发展理念来破解，为了更好地评价这一理念的贯彻情况，我们对经济发展质量构造数量化的指数，详细刻画西部地区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方面所做的努力。具体来讲，通过对创新载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测度来反映创新发展理念，通过对经济结构合理性的测度来反映协调发展理念，通过对生态成果的测度来反映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对经济外向性的测度来反映开放发展理念，通过对医疗水平的测度来反映分享发展理念。

^① 师博：《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26~132页。

二是以有限但有效的测算为基础。首先,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如果过分强调全面可能会因其概念晦涩难懂而不具有可实施性。其次,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属性特征,对其各个维度均进行测评会因为缺少相关数据而不具有可操作性。最后,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评价标准难以统一。所以本文力求用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来测度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对其进行较客观地评价,希望通过简明且易形成共识的指标,为经济发展质量确定努力的方向,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地方优势出发,制定相应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以弱化经济增长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业已转换,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工作的关注重点已经由经济增长速度转向经济发展质量,更意味着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好”与“快”有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高质量发展阶段速度肯定是逐步下降的。^①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已经不需要过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增长保持基本稳定和可持续的条件下应将经济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质增效上。^②所以本文所构建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重在反映经济发展的强度、稳定性、合理化和外向性,更加重视反映社会、生态的发展变化情况。

三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方法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尽快建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不仅可以找出当下经济发展质量所存在的问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还可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进行量化评估。这也是我们在制定西部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时的基本遵循。

笔者参照 Mlachila 等^③的方法,从三个维度表征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① 蔡昉:《转向高质量发展“三谈”》,《经济日报》2018年2月8日。

② 胡敏:《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考评》,《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月18日。

③ Mlachila, M., Tapsoba, R., Tapsoba, S. J. A., 2014, A Quality of Growth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roposal, IMF working paper, NO. 172.

经济发展质量 = α 发展基本面 + β 发展的社会成果 + γ 发展的生态成果

发展基本面 = $\Theta 1$ 强度 + $\Theta 2$ 稳定性 + $\Theta 3$ 合理化 + $\Theta 4$ 外向性

发展的社会成果 = $\varphi 1$ 每万人大学生人数 + $\varphi 2$ 每万人医生人数

发展的生态成果 = $\eta 1$ (单位 GDP 气体污染 GDP 排放物) + $\eta 2$ (单位 GDP 固体污染物排放产出) + $\eta 3$ (单位 GDP 液体污染物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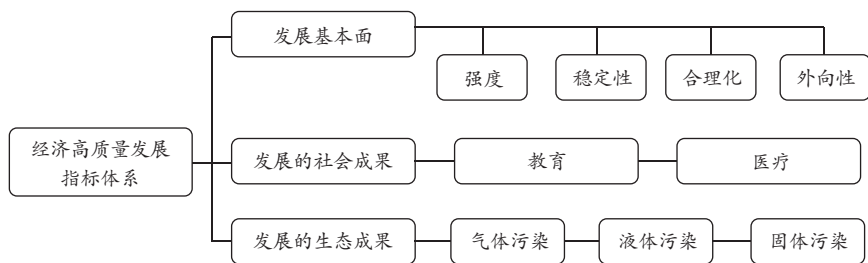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面可表述为：(1) 经济发展的强度，采用实际人均 GDP 来测度。一个地区的人均 GDP 越高代表其产出能力越强，则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经济发展越强劲。(2)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用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来度量。变异系数可以衡量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程度。一个地区如果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越差，极易发生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干扰，省级增长率变异系数采用 5 年期滚动窗口的方法进行测算，市级增长率变异系数采用 3 年期滚动窗口的方法进行测算。(3) 经济发展的合理化，用 1 与泰尔指数的差值来表征。借鉴干春晖等^①的方法，利用三次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来计算泰尔指数，用以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干春晖等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越合理，经济波动越小，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越高。(4) 经济发展的外向性，用净出口占 GDP 比重来衡量。外向型经济有助于本地区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联系，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人员交流等渠道的技术溢出提高本地区的生产率。

经济发展社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创新发展理念的落实情况。全体社会成员均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拓展自身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进而凭借自身能力公平享有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人力资本还是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创新发生的概率。

^①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4~16 页。

所以,本文从人力资本视角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测度社会发展成果:(1)教育,是人力资本在知识和创新层面的表征。在省级层面笔者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加以衡量,地级市层面则采用平均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2)医疗,作为人力资本在健康层面的表征。笔者用每万人医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在经济发展中所获得的发展能力和机会越大,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社会福利越高。

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果与绿色发展理念紧密联系,具体包括:(1)单位GDP气体污染排放产出;(2)单位GDP固体污染排放产出;(3)单位液体污染排放产出。这三个指标均表示在既定经济产出量上的污染排放量。在给定的污染排放水平情况下经济产出水平越高,则说明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果越好。

以上指标具有不同量纲,因而不可以直接合成。本文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变换和处理,然后通过设定相应权重将变换后的指标加总计算得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主成分分析法虽然可以依据数据特征来对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指标进行客观赋权^①,但是该方法也会因为降维而使原始指标丧失经济含义,并且当变量个数过多时也不易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协调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把物质生产、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有机联系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因此,本文参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经济脆弱度指数(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dex),对各基础指标赋予简单而透明的均等权重。具体而言,对“发展的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和“发展的生态成果”三个维度各赋予1/3的权重,以凸显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发展的同等重要性。相应地,“发展的基本面”下属指标的权重均为1/4,“发展的社会成果”二级指标的权重均为1/2,“发展的生态成果”下属指标的权重为1/3。虽然采用简单而透明的均等权重法赋值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这里旨在强调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多方位均衡发展。

为了更好地评价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本文将其置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中,通过比较分析加以综合考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始于1992年,所以在省级层面本研究测算了1992~2017年的经济发展

^① 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40页。

质量指数。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在市级层面本研究计算了2004~2017年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其中计算省级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市级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CEIC数据库。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可比性，省级数据以1992年为基年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地级市数据以2004年为基年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四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 西部省级经济发展质量

1. 与中东部发展情况的比较分析

图2展示了自1992年以来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省份平均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在研究时段内东部省份的平均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最高，西部省份指数最低，中部省份指数值居中，表现出与经济增长数量相类似的地理分布情况。1992~2017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变化趋势与全国保持一致，并且在整个研究时段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和东中部地区虽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2012年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向东中部地区收敛的态势。具体来看，2011年之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距虽有小幅波动但二者差距大致保持不变，2012年之后两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距先扩大再缩小，预计未来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2011年之前西部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差距出现缓慢扩大的趋



图2 1992~2017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

势，但是2012年之后两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波动中逐渐缩小，预计未来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

2.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分析

(1) 发展质量指数

1992~2017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0.2530。在2011年之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均值为0.2543，其间大致经历了4个完整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为1992~1994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有过一个短暂的小幅波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伊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给西部经济发展带来小幅冲击。第二个周期为1995~1997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上扬态势。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其发展质量指数持续上升并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1997年达到历史峰值0.2875。第三个周期为1998~2006年，该时期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造成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制约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在波动中上升乏力；第四个周期为2007~2011年，虽然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引领下依旧稳步提升。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加之传统要素驱动高速增长所累积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出现小幅下滑。民生问题的解决和生态环境的恢复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应针对民生问题精准施策，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随着社会生态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预计未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会进一步提高。

(2) 发展质量的收敛性分析

从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性来看，1992~2017年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方差最大，为0.0148，中部地区方差最小，为0.0028，西部地区的方差为0.0033，居于二者之间。图3描绘了1992~2017年西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化程度，1992~1995年西部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变异系数波动较大，1996~2003年变异系数在波动中上升，2004~2010年变异系数缓慢下降，2011年之后变异系数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预计未来西部地区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差异不会进一步扩大。

(3) 发展指数分维度分析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分维度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发展基本面的均值最高，为0.5197，社会成果指数均值最低，为0.1232，生态成果均值居中，为0.1416。在整个样本期，发展基本面指数均高于经济发展质量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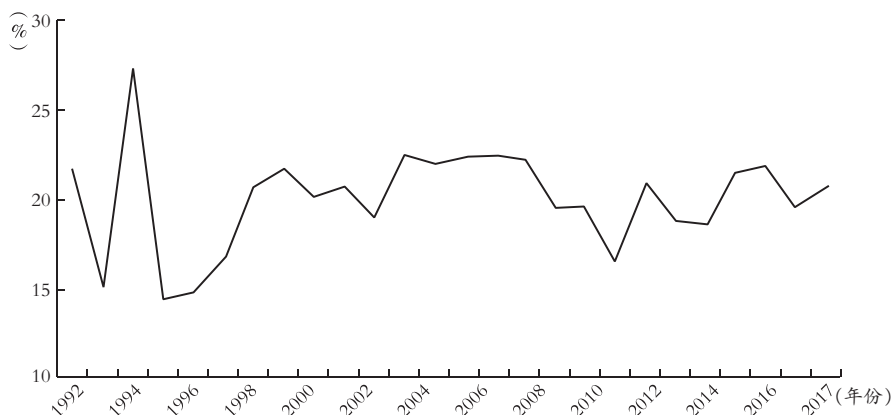


图3 1992~2017年西部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变异系数

数,说明经济发展是驱动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而社会和生态成果方面的绩效不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部省份在社会和生态层面的发展空间较大。发展基本面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中表现最好,1992~2011年发展的基本面均值为0.5184,2012~2017年为0.5249,不论过去还是现阶段西部地区发展基本面均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部各省份在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视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

西部省份社会成果指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中表现不佳,1992~2011年西部地区社会成果指数均值为0.1128,2012~2017年的均值为0.1651,大致提高了46.43%。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应再接再厉,找准其社会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周密谋划、用心布局,进一步巩固社会发展成果。

1992~2011年西部省份的生态成果均值为0.1516,2012~2017年生态成果均值为0.1015,出现下滑,可能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污染作为工业化的非期望产出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脆弱的生态系统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恢复。随着各类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以及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推进,预计未来西部地区的生态发展会有所改善。

(4) 省际发展的动态变化

1992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排名前三的省份是新疆、内蒙古和云南,2011年排名前三位的省份则变为陕西、重庆和四川,2012年重庆又超越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第一名。2017年西部经济发展质量最好的省份仍然是重庆、陕西和四川。在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重庆、陕西和四川三个省市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西部地区

整体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在研究时间段内贵州的经济发展质量进步较明显,由1992年西部省份排名最后到2017年位居西部省份第四名;而青海的经济发展质量则表现不佳,由1992年西部省份排名第五滑落至2017年的最后一名。青海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努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积极主动向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高的省份看齐。

从发展基本情况来看,1992~2011年内蒙古、四川和陕西在西部地区发展基本面指数均值排名前三;2012~2017年重庆、新疆和云南则成为西部地区发展基本面最好的三个省份,其中云南进步最为明显,由过去的倒数第一追赶为现阶段的第三名,而内蒙古则由过去的排名第一倒退为现阶段的最后一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内蒙古应积极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经济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以科技创新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992~2011年新疆、陕西和内蒙古的社会成果均值排名前三,2012~2017年陕西省则跃升至第一名,内蒙古滑落后为第三名,而重庆则晋升为第二名。在过去和现阶段西部地区社会成果排名中,贵州一直排在末位,表明贵州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着重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1992~2011年陕西、四川和重庆为西部地区生态成果均值排名前三的省份,2012~2017年这三个省份生态成果仍然最好,只是四川、重庆排名分别上升为第一、二名。宁夏的生态成果在西部地区排名中不论过去还是现阶段均为最后一名,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宁夏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比较脆弱,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应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

(二) 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1. 与中东部城市发展的比较分析

图4给出了2004~2017年全国及东、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我国城市间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保持着和省级相一致的地理分布态势,东部城市最高、中部城市次之、西部城市最低。2004~2017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同东中部城市相同的变化趋势,在整个研究时段内西部城市和东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差距较大,但该差距在波动中逐渐缩小。相较之下,西部城市和中部城市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差距较小且正稳步缩小。预计未来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会逐步向东中部城市收敛。

2. 西部城市整体综合评价分析

(1) 发展质量指数

2004~2017年西部城市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0.2739,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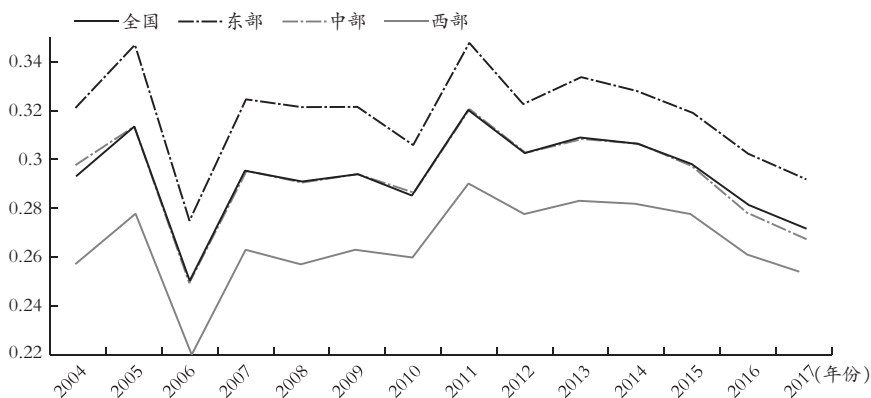


图4 2004~2017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

高值出现在2011年，达0.2985，最低值则出现在2006年，为0.2290。

2004~2011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0.2692，该时期指数波动较大，大致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为2004~2006年，呈现一个短暂的波动状态；第二个周期为2007~2011年，表现出显著的攀升态势。2012~2017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平均指数为0.2800，比2011年之前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大致提升了40%，说明在创新驱动的引领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正逐步提升。

(2) 发展质量的收敛性分析

从各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性来看，研究时段内东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方差最大，为0.0047，中部最小，为0.0041，西部居中，为0.0046，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性略小于东部城市，但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波动性仍高于东部城市。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西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收敛性，2004~2011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方差为0.0046，2012~2017年则为0.0045，2011年后西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更为趋同，预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西部城市会继续保持这一趋势。

(3) 发展指数分维度分析

2004~2017年各分维度指数显示，西部城市发展基本面均值最高，达到0.3728，社会成果均值最低，为0.2000，生态成果均值居中，为0.2519，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的均值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整个样本期，发展的基本面指数均高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说明经济发展同样也是驱动西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虽然西部城市在社会和生态层面的发展不足，但其提升空间仍然较大。如果未来西部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加大

对社会和生态方面的重视程度，预计其发展质量会得到极大提升。

具体来看各分维度指标：2004~2017年地级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面在经济发展质量的三个维度中表现最好，其中2004~2011年指数均值为0.3751，2012~2017年基本面均值为0.3692。西部地级城市发展的基本面一直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来西部城市会在该维度上“稳中有升”。2004~2017年西部地级城市社会成果指数在经济发展质量的三个维度中表现不佳，2004~2011年社会成果的均值为0.1958，2012~2017年社会成果的均值为0.2068。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部城市的社会成果指数值均较低，一方面说明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对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上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和医疗的现代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一个地区的软实力，社会成果指数值较低从侧面反映出西部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GDP等硬实力提升，对软实力的提高有所忽视。因此，西部城市在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权衡好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和关系，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从而带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社会发展方面有所突破。2004~2017年西部地区城市生态成果指数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其中2004~2011年西部城市生态成果指数均值为0.2369，2012~2017年西部城市生态成果指数均值为0.2759，提高了16.5%。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西部城市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经济产出的提高伴随着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导致西部地区生态建设成果不佳；而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西部城市在生态建设方面不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未来西部城市在生态建设方面会取得更大成绩。

（4）各城市间发展的动态变化

2004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南宁、呼和浩特、桂林、兰州、乌鲁木齐、成都、银川、西安、昆明和克拉玛依。除桂林和克拉玛依外其他城市均为西部省会城市，前十位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值为0.2690。2011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桂林、南宁、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兰州、咸阳、成都、西安、昆明和柳州。鄂尔多斯、咸阳和柳州三个非省会城市成功跻身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排名前十的行列，前十位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值为0.2985，比2004年提高大约11%。2017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乌兰察布、克拉玛依、成都、昆明、西宁、银川、柳州、西安、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除乌兰察布、克拉玛依和柳州外，其

余均为西部省会城市，可见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名前十的城市仍然以省会城市为主，前十名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值为0.2603。西部省会城市在整个研究时段内经济发展质量比较高，因此西部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引领作用，各城市应以省会城市为榜样探索适合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从发展基本面来看，2004~2011年昆明、克拉玛依、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南宁、乌鲁木齐、成都、西安和兰州在西部城市中发展基本面指数排名前十，以省会城市为主。2012~2017年昆明、包头、鄂尔多斯、克拉玛依、呼和浩特、六盘水、重庆、乌鲁木齐、玉溪和崇左成为西部地区该维度表现最好的十个城市，与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非省会城市跻身发展基本面指数排名前十行列，预计未来非省会城市 and 省会城市在发展基本面上的差距会逐步缩小。从社会成果指数均值来看，2004~2011年呼和浩特、昆明、桂林、兰州、贵阳、南宁、成都、咸阳、乌鲁木齐和西安是在社会发展方面排名前十的西部城市。2012~2017年桂林、昆明、兰州、呼和浩特、贵阳、乌兰察布、咸阳、南宁、成都和鄂尔多斯则成为西部地区社会建设成果最好的十个城市，除乌兰察布和鄂尔多斯为新晋城市外，其他八个城市仍停留在前十行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拥有较好生态建设成果的西部城市在社会发展方面保持稳定，但其并未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没有带动更多的城市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从生态成果指数均值来看，2004~2011年庆阳、延安、南充、天水、资阳、遂宁、成都、固原、丽江和防城港为前十名城市，除成都外其余城市均为非省会城市；2012~2017年巴中、庆阳、达州、资阳、广元、成都、遂宁、铜川、西安和安康是在生态发展方面排名前十的西部城市，在生态方面发展较好的西部城市仍然以非省会城市为主，其中以四川省地级市居多。西部地区在生态保护方面应注重发挥非省会城市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四川省的城市，加强各城市之间经验交流，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五 提升西部经济发展质量的政策建议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背景，经济发展质量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遵循。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现在，具有增速稳定和结构合理的经济增长基础，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

全面发展^①。本文基于发展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 3 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测度中国省级和地级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基础上，置于全国发展的基本背景下，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笔者分析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且其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变化与中东部地区有趋同的态势；西部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高，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西部地区需要多管齐下，在经济发展质量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补齐区域经济发展短板是西部地区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的首要任务。尽管从 2011 年之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向东中部经济收敛的特征，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西部经济仍处于落后和不充分发展的状态。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因此，西部地区必须集中精力聚焦区域发展，形成新的区域发展动能。当然，新时代的发展必须遵循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与要求，必须遵循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西部地区应打“政策组合拳”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具体而言，通过激励型政策强化科技创新，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通过结构性政策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通过协调型政策有效衔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应围绕自身的发展布局，培养和引进大量与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相关的创新人才，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

第三，补齐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短板，助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增加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入力度，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使人民群众在共享多样性发展成果中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加快恢复西部地区的绿水青山生态价值；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积极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① 师博：《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126～132 页。

第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区域合作。推动西部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发展机制，转变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单一考核机制，实施以“发展质量”为核心的多维评价体系，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诉求。经济绩效考核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即由仅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转变为要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过程中，亟须从区域竞争模式转型为区域合作模式，积极搭建省份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合作平台，通过发展质量较好的省份帮扶较差省份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以省会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推动区域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